

■第一阅读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柴 静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画画:“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儿而打40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100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睛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冒着大雪送我回家,“她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看,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了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种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翻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来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屁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播“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



看见
柴静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质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着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35度、45度、60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间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吗?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点,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进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7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18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2003年2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地气气,”他说,“知道为什么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几十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攀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6.8级的地震,200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

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

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在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阿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5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1400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一阵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对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品 鉴

《地方官》: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

□张永权

邵瑞义的长篇新著《地方官》一出版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关注。当然这和该书是反腐题材有关。无论是官场小说,还是反腐作品,要能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肯定,不仅在于题材是否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最主要的是看作品是否具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感染力。作为长篇小说,题材和故事都只不过是载体,深度的思想开掘和典型的人物塑造,才是作品成功的关键。

从这两方面看,《地方官》都有亮点,是一部能让心灵受到撞击和感动的好作品。

从表面上看《地方官》是一部反映市县级官场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作品在改革开放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反腐题材作了深度的开掘。省委指派到凌华市的市委书记邝道源,从心怀一个环境条件较差、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改变成经济发达、环境优雅的城市的浪漫理想,到蜕变成为贪污受贿、生活堕落、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异己、与黑恶势力勾结的腐败分子。小说通过邝道源的为官之路与黑恶势力人物袁承峰、贾大奎等人的相互利用勾结和凌华市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旧章,纪委书记余昌华,人大主任辛高平,国土局长汤银中等党内的健康力量以及老钢炮、辛老八等农民群众与他们的斗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和必要性。小说决不是那种以反腐为幌子,为达到某种商业利益而进行炒作的作品,而是通过对题材的正确把握和思想的深度挖掘,对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使这部作品主题思想严肃深刻,人物形象典型,个性鲜活。是一部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震撼力的优秀长篇小说。

《地方官》对反腐题材的深度开掘首先在于作家以干预官场现实生活的勇气和直面官场种种矛盾的作家良知,以宏大的小说构建和众多而典型的人物,展现了一幅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官场生活的斑斓画卷。小说以凌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工作生活为中心,将笔触伸进区县和乡村,甚至走笔高江省委。这就把广阔的官场生活和众多的官员形象纳入作品中,有助于更真实、更全面,也更具有典型意义地写出当今官场生活的一斑一叶。凌华市的这些不大不小的的地方官,有像高旧章、余昌华等这样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始终为民谋利的官员。也有像邝道源、袁承峰那样以权谋利、独断专行,与黑恶势力勾结的腐败分子。小说就以这两类官员为情节走向的中心,把官场、商场、情场、城市、农村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其中;以他们不同的为官之道,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尖锐复杂甚至让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作品围绕邝道源在香枫村征万亩良田,建人造湖所产生的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交织描写邝道源与腐败分子袁承峰、黑恶势力贾大奎互相利用勾结的阴谋勾当以及党内健康

力量和他们的斗争,让我们看到了这场反腐斗争的惊心动魄与尖锐复杂。邝道源赴凌华上任不久,半推半就接过袁承峰的那个信封后,就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问题演化蜕化,在腐败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一把手的腐败造成的危害让人心惊胆战。凌华市成了邝道源的独立王国,黑恶势力横行无阻的天下。市里的一些官员遇刺,到凌华市调查的省委书记的车被拦,反对强占土地的村委会主任被杀……省委为了弄清凌华的问题,不得不派探子以开商店为掩护进行暗访侦察。最后小说以香枫村民因张二狗卷走千万元农民的征地资金为导火线,引发万人到市委上访,由于黑恶势力打死辛八爷造成更大的游行示威行动,将矛盾升级,引起省委的高度重视,大刀阔斧地解决凌华问题,惩处了袁承峰,摧毁了黑恶势力,从而以血的教训揭示了腐败分子不除必将亡党亡国的深刻思想。这也深度开掘出了反腐题材的时代价值和长远意义。干预生活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长篇小说具有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规律的功能,敢于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反映生活中的阳光面,又敢于干预生活中的阴暗的东西,才能构建起长篇小说充实、宏大的结构,从而更有力地反映生活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官》无疑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干预现实生活的长篇力作。

创作反腐题材作品,不仅要敢于干预现实生活,勇于揭示矛盾冲突,还要注意把握好矛盾冲突的“度”。《地方官》在这方面也有亮点。凌华市虽然一度成了腐败分子的独立王国,但它始终还是在党的领导控制之下,特别是一批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直在和黑恶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因为一把手的腐败,使得这些斗争不得不以“地下”的形式进行,但给腐败分子的震慑和打击却是明显和有力的。当今某些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影视剧,由于把正面力量写得软弱无能,而腐败分子又过于强大,虽然最后也是以腐败分子的失败而告终,但还是正不压邪,难以让人相信,也违背了现实生活的真实。而《地方官》却在反映腐败分子阴谋勾当的同时,写出了他们对正义力量的畏惧心理,更写出了正义力量多种形式的斗争,显示了党的领导在战胜腐败势力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地方官》对反腐题材的思想内涵作了深度开掘,从作品的情节和塑造的人物中自然流露出来。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又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邝道源作为一名由通过自我奋斗成才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名主管一个市的领导干部,由一个在性格上刚愎自用、惟我独尊、好大喜功,爱搞花架子的形式主义者蜕变成腐败分子,其典型意义不仅具有警示作用,还提出对重要岗位干部的任用,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考察。决不能因为强调选

择知识型、专家型领导干部,而忽视对其“德”的要求。与之相对立的人物——市长高旧章、纪委书记余昌华等,他们身上既有坚持党性原则、权为民所用的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共性,又有其“这个”典型的性格特征的鲜活显现。像高旧章在受到邝道源的排斥和黑恶势力的打击时,心中不忘民生,深入基层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旱大涝中夺粮。但性格中的善良软弱、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又使他在和腐败分子的斗争中缺少锐气和霸气。最终未能主动及时把邝道源的问题反映到省委,在省委解决凌华问题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带有一点点悲剧性的结局。而余昌华则敢于斗争、有勇有谋,在处理凌华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勇敢站出来和邝道源对峙,又足智多谋对腐败分子袁承峰敲山震虎,及时把凌华的问题反映到省纪委。党性和个性在他身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其他人,如魏成国漂浮不定的神秘和坚定性格中的人性光环,为救陷得不深的官从坤,说服他拿出钱来为凌华市应急,将功补过。腐败分子袁承峰的机智与残忍、一掷万金的黑帮头目贾大奎的无耻奸诈与老农民辛八爷的正义与善良等等,都以其不同的性格,给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鲜活感。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上至省委书记,下到最底层的村委会主任、普通百姓